

马 克 弗 森

民主的政治哲学

许国贤著

東大圖書公司印行



世界哲學家叢書

馬 克 弗 森

——民主的政治哲學

許 國 賢 著

東大圖書公司印行

馬克弗森／許國賢著．--初版．--臺北市
：東大發行：三民總經銷，民82
面；公分．--(世界哲學家叢書)
參考書目：面
含索引
ISBN 957-19-1496-7 (精裝)
ISBN 957-19-1497-5 (平裝)

1. 馬克弗森(Macpherson, Craford
Brough, 1911-1987)-學識-政治

570.953

82005808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一九七號

基本定價 肆元肆角肆分

編號 E 14048

初版 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九月

重慶店／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十一號
郵撥／〇一〇七一七五—〇號

復興店／臺北市復興北路三八六號六樓

印刷所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銷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產權人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著作人 劉仲文

發行人 許國賢

©馬克弗森
——民主的政治哲學

ISBN 957-19-1497-5 (平裝)

「世界哲學家叢書」總序

本叢書的出版計畫原先出於三民書局董事長劉振強先生多年來的構想，曾先向政通提出，並希望我們兩人共同負責主編工作。一九八四年二月底，偉勳應邀訪問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三月中旬順道來臺，即與政通拜訪劉先生，在三民書局二樓辦公室商談有關叢書出版的初步計畫。我們十分贊同劉先生的構想，認為此套叢書（預計百冊以上）如能順利完成，當是學術文化出版事業的一大創舉與突破，也就當場答應劉先生的誠懇邀請，共同擔任叢書主編。兩人私下也為叢書的計畫討論多次，擬定了「撰稿細則」，以求各書可循的統一規格，尤其在內容上特別要求各書必須包括（1）原哲學思想家的生平；（2）時代背景與社會環境；（3）思想傳承與改造；（4）思想特徵及其獨創性；（5）歷史地位；（6）對後世的影響（包括歷代對他的評價），以及（7）思想的現代意義。

作為叢書主編，我們都了解到，以目前極有限的財源、人力與時間，要去完成多達三、四百冊的大規模而齊全的叢書，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光就人力一點來說，少數教授學者由於個人的某些困難（如筆債太多之類），不克參加；因此我們曾對較有餘力的簽約作者，暗示過繼續邀請他們多撰一兩本書的可能性。遺憾

2 馬克弗森

的是，此刻在政治上整個中國仍處於「一分为二」的艱苦狀態，加上馬列教條的種種限制，我們不可能邀請大陸學者參與撰寫工作。不過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獲得八十位以上海內外的學者精英全力支持，包括臺灣、香港、新加坡、澳洲、美國、西德與加拿大七個地區；難得的是，更包括了日本與大韓民國好多位名流學者加入叢書作者的陣容，增加不少叢書的國際光彩。韓國的國際退溪學會也在定期月刊《退溪學界消息》鄭重推薦叢書兩次，我們藉此機會表示謝意。

原則上，本叢書應該包括古今中外所有著名的哲學思想家，但是除了財源問題之外也有人才不足的實際困難。就西方哲學來說，一大半作者的專長與興趣都集中在現代哲學部門，反映着我們在近代哲學的專門人才不太充足。再就東方哲學而言，印度哲學部門很難找到適當的專家與作者；至於貫穿整個亞洲思想文化的佛教部門，在中、韓兩國的佛教思想家方面雖有十位左右的作者參加，日本佛教與印度佛教方面却仍近乎空虛。人才與作者最多的是在儒家思想家這個部門，包括中、韓、日三國的儒學發展在內，最能令人滿意。總之，我們尋找叢書作者所遭遇到的這些困難，對於我們有一學術研究的重要啓示（或不如說是警號）：我們在印度思想、日本佛教以及西方哲學方面至今仍無高度的研究成果，我們必須早日設法彌補這些方面的人才缺失，以便提高我們的學術水平。相比之下，鄰邦日本一百多年來已造就了東西方哲學幾乎每一部門的專家學者，足資借鏡，有待我們迎頭趕上。

以儒、道、佛三家為主的中國哲學，可以說是傳統中國思想與文化的本有根基，有待我們經過一番批判的繼承與創造的發

展，重新提高它在世界哲學應有的地位。為了解決此一時代課題，我們實有必要重新比較中國哲學與（包括西方與日、韓、印等東方國家在內的）外國哲學的優劣長短，從中設法開闢一條合乎未來中國所需求的哲學理路。我們衷心盼望，本叢書將有助於讀者對此時代課題的深切關注與反思，且有助於中外哲學之間更進一步的交流與會通。

最後，我們應該強調，中國目前雖仍處於「一分为二」的政治局面，但是海峽兩岸的每一知識分子都應具有「文化中國」的共識共認，為了祖國傳統思想與文化的繼往開來承擔一分責任，這也是我們主編「世界哲學家叢書」的一大旨趣。

傅偉勳 韋政通

一九八六年五月四日

誌 謝

感謝下列單位及個人在相關資料的蒐集上所給予之協助：

劍橋大學圖書館

大英圖書館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圖書館

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圖書館

拉特格斯大學圖書館

馬里蘭大學巴爾的摩分校圖書館

政治大學圖書館

政治大學社會科學資料中心

中央研究院社科所圖書館

中央研究院歐美所圖書館

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

中央圖書館

森大圖書公司

大統圖書公司

桂林書局

傅可暢先生

宋美珍小姐

翁惠芬小姐

吳秀卿小姐

給 素芹

自 序

政治思想史的工作是對過往的政治理論思潮進行再理解、再挖掘和再詮釋，政治哲學則是對人類當前所面臨的政治處境做哲學的思辨。在當今西方世界裏，同時涉足這兩個性質並不相同的領域的理論家，可謂並不多見，馬克弗森則為其中之一。雖然馬克弗森主要是以英語世界的思想遺產為其論述及反思的主題，但他卻能夠突破語言世界的限囿，並從他特定的思想立場出發——試圖調解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以及試圖將政治研究的基本關懷重新回置到如何開發人的可能性的立場——去勾勒出思索人類當前的政治存在所不能規避的根本問題，同時也進一步提出他個人的解答。本書的主要目的即是透過對於馬克弗森的考察，來探究我們時代的政治實踐與政治理論的若干相關問題。當然，對於馬克弗森的分析 and 討論，仍然是本書的主軸。

就發生學的背景來說，本書是筆者於一九九二年六月繳交給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博士班的學位論文，在此要特別感謝我的指導教授郭博文教授和江金太教授，此外，吳庚教授、李永熾教授和華力進教授也給予許多令我受用的批評意見。而在我任職於中央研究院社科所期間，郭秋永先生、麥朝成先生和彭文賢先生慷慨地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工作環境，讓我能安定地進行研究和思考。麥先生之督促我重新回到學校修讀學位（一九八八年），則改變了我在現實生活裏的既定道路。再者，本書可謂是與張福建、

蘇文流、王達義在相互統合的知識志業與探索歷程底下的產物，同他們的交流切磋使本書能避免更多的及更明顯的缺陷和遺憾。尤其，福建既贈予他原先蒐集的有關馬克弗森的研究資料，並說服我去研究馬克弗森（我原先是準備對K. Marx和G. A. Cohen做比較研究），他無疑地乃是本書的催生者。最後，內人素兄一直是我在知識道路上前行的支柱，也是分享我們的理想與希望的伴侶，我由衷感謝她持恆的慰安同鼓舞，她和潯兒使我能更人文地理解這個世界。

對我個人而言，這本書可算是告別我第一階段的學徒生涯的文字記錄，十分感謝章政通教授和傅偉勳教授將之列入他們主編的「世界哲學家叢書」。錢賓四先生在寫給嚴歸田先生的一封信裏，談到他之憚於修改《國史大綱》一書時曾謂：「一書既成，亦只有仍之。若要在體裁或內容有改進，此極費力，所以著書戒速成也。」（嚴著，《錢穆賓四先生與我》，第一〇五頁）本書亦由於未能戒速成，故只能一仍其舊，而僅在若干處略做增補。在告別第一階段的學徒生涯之後，我期望在爾後能逐步完成一些更具企圖心及原創性的思考，畢竟，中國人思想天地的再創開，仍需要更多的人在更多樣的面向，做出更篤實的投入。

G. K. 一九九二年八月，臺北

目次

「世界哲學家叢書」總序

自序

第一章 導論 1

第二章 佔有式個人主義與政治理論 11

第一節 從政治思想史到政治理論 14

第二節 佔有式個人主義 25

第三節 霍布斯 32

第四節 平等派與哈林頓 44

第五節 洛克 54

第六節 馬克弗森做為一個政治思想史家 63

第三章 民主動性的展開與限制 81

第一節 民主類型的多元性 84

第二節 自由主義民主的特殊性 89

第三節 自由主義民主模式的演化 96

第四節 民主想像的再展開 114

第四章 經濟的政治(一)：財產 129

2 馬克弗森

第一節 財產與政治理論	130
第二節 自由主義民主與財產	135
第三節 新財產觀與人類實現	141
第四節 檢討與評估	146

第五章 經濟的政治(二): 經濟民主、 經濟正義與市場

第一節 經濟民主做為民主社會的要素	160
第二節 經濟正義	170
第三節 資本主義市場經濟	180
第四節 民主社會的經濟基礎	190

第六章 民主社會的格局

第一節 參與式民主	202
第二節 發展的自由	218
第三節 平等	229

第七章 結 論

外國人名漢譯表

馬克弗森年表

參考及引用書目

索 引

第一章 導 論

在「必要的惡」與「善的實現」的兩極之間，政治被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加以理解及定位。而在後政治社會(post-political society)尚無法被想像之前，如何理解甚至改造政治，乃是一個嚴肅的理論的及實踐的課題。在這樣的背景底下，政治理論做為理解及改造政治的系統化的論述，就有著獨特的存在樣態。如克里克(Bernard Crick)所言，「政治理論本身就是政治的」^①，政治理論除了是對政治的反省與思考，更是一種試圖從特定的方向去塑造政治的主張或意識型態。或者，如同另一位論者所指出的，政治理論既是一項詮釋的事業(hermeneutic enterprise)，也是一項批判的事業(critical enterprise)^②，其詮釋的特質與批判的特質在形式上雖可分立，但在實質上則是相互共生的。

但並不是每一種政治理論都清楚地表現出上述的性質，有些政治理論的政治性已經被馴服(因為其主要是以別的政治理論為思索的對象，而逐漸怠忽了直接面對政治的必要性)，另有一些政治理論則格外專注於詮釋之展開(雖然它可能是一種「批判的」詮釋)。做為一個在方法上及批判的態度上皆有其獨特立場的政治理論家，馬克弗森(Crawford Brough Macpherson, 1911~1987)的政治理論則明顯地統合了政治的、詮釋的及批判的特質。自一九七〇年代以來，政治理論雖然已逐漸擺脫了前一個

世代所憂心的被經驗研究所取代的危機，但在羅爾斯（John Rawls）、諾吉克（Robert Nozick）等人手中，政治理論在復興的同時卻也顯現出另一個值得檢討的趨勢。那就是學院的政治理論愈來愈傾向於在空洞化的、脫離歷史系絡的格局裏進行政治判斷，同時後設理論（metatheory）與範疇取代了人與其具體的政治情境，成為政治思索的主要對象。衰聶爾（John G. Gunnell）曾以「政治理論的異化」來形容這樣的趨勢，「異化了的政治理論自認是在探討政治，同時也有這麼做的權威，但它沒有做到前一項，也缺乏後一項。」^④衰聶爾的批評似乎太過於低估了哲學思辨在討論價值問題及政治可能性的作用，不過，他的疑慮也不是完全沒有憑據的。如果說衰聶爾在方法上嚴厲批判了政治理論的異化趨勢，則馬克弗森可謂是以實際的作為去鋪陳解異化的（de-alienated）政治理論。

從其學術出版的紀錄來看，馬克弗森並不是一個少享大名的理論家。雖然他自一九三五年起就開始在他的母校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政治經濟系講授政治理論課程，但一直要到一九五三年才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亞爾貝塔的民主》^⑤。該書旨在研究加拿大西部省分亞爾貝塔省的政黨政治的發展，特別是亞爾貝塔農民聯盟和爾後的社會信用運動如何由一個反政黨的民主結合退化成一個獨大的、同時也違背其民主理想的準政黨，以及加拿大東部先開發地區對西部地區的政治控制及支配關係。無疑地，《亞爾貝塔的民主》的關注及格局是純加拿大式的，這反映了政治學做為一門獨立的學問在加拿大的筆路藍縷的開發歷程；不過，回溯地看，該書卻也明確指出了爾後馬克弗森最主要的理論關懷，那就是民主社會的建構。一九六〇年代則是馬克弗森確立其國際聲

譽並回歸到西方政治思想的大傳統的年代，他將早先發表於《西部政治季刊》（*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和《過去與現在》（*Past & Present*）的十七世紀英國政治思想研究，擴增成《佔有式個人主義的政治理論：霍布斯到洛克》一書^⑥，並以更具有歷史穿透力的視野表達了他對英語世界主流政治思維的反省和批判。如他所強調的，我們「應該進行什麼樣的根本的整修，端賴於對弱點的診斷」^⑦，在他看來，當代西方的主要政治信念係奠基於十七世紀，他之以十七世紀的政治理論做為考察的起點，就是為了找出修補同改革現代政治的基本方向。此外，在這個時期裏，他也藉著主講一九六五年加拿大國家廣播公司梅謝講座（Massey Lectures）的機會，提出了他對人類民主處境的初步思考^⑧。

一九七〇年代則是馬克弗森對民主之思考的進一步精緻化及深刻化的時期，他的著力點在於其民主理論的建構和對於自由主義民主思潮的歷史演化的模式分析，《民主理論：修補論文集》和《自由主義民主的生命與時代》即是此一階段的成果^⑨。我們可以說，馬克弗森的政治理論在這個時期已完全成型，並使他成功地從政治思想史家的身分過渡到政治理論家的身分。從這個立足點回顧他的前期著作，我們可以看出他是有意識地一步步邁向其理論典範的建構，他早先的研究過程中所遭逢的問題及所蘊生的不滿，促使他去鋪陳出他自認能夠對應他所挖掘出來的問題的理論。而他逝世前兩年結集出版的《經濟正義的興起與衰亡及其他論文集》^⑩，則可謂是在其理論典範已然確立的背景下，進一步去補強、密實其理論典範的後援工作。

早在一九五四年，馬克弗森著文評論他在倫敦政經學院求學

時期的業師拉斯基 (Harold Laski) 所寫的《我們的時代的困境》一書時曾表示，拉斯基的論點「所憑依的假設對自由主義者來說太過於馬克思主義傾向，同時對共產主義者來說則太過於自由主義傾向。」¹⁰而在一九五一年他評論薩拜恩 (George Sabine) 的《政治理論史》一書時則感歎，「美國的意識型態氛圍使得對於馬克思主義和自由主義的理解，顯得愈來愈困難。」¹¹事實上，上述的第一段評論恰恰也適用在馬克弗森自己身上，而第二段評論則貼切地表達了他所欲克服的詮釋的困境以及他所欲達成的政治視野的整合。總的來說，在自由主義當道並成為西方世界的不容懷疑的政治信念，同時馬克思主義卻被不當地扭曲及矮化的時代（當然現今的情勢已有很大的不同），馬克弗森一方面要給予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更篤實的評估，並將評估後的新理解適切地應用到政治社會的考察之上，另一方面則企圖整合他所認為的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或者更廣義地說，社會主義）裏的正面質素，以開展出一種強調人做為人的存在價值的政治理論。由於他政治理論裏的這種調和性格，馬克弗森之遭到自由主義者及馬克思主義者的強烈批評是可以想見的。以後一種立場來說，馬克弗森的整個努力雖被肯定為「重新政治化了 (repoliticize) 政治哲學」¹²，但卻又被嚴酷地批評為只是一種「空洞的形式主義」和「烏托邦式的道德主義」¹³。我們以為，馬克弗森的調和企圖雖不免暴露出內在的困難，但其用心實不應被率爾輕忽。

晚近的政治哲學逐漸呈現出兩種不同的研究取向的事實，似乎已越來越明顯。為了便於討論，讓我們姑且以「哲學取向的政治哲學」(philosophy-oriented political philosophy)和「政

治學取向的政治哲學」(politics-oriented political philosophy)來概略區分這兩種研究取向。必須先行說明的是，這樣的分野並不是一種界線分明、不相踰越的區劃，而只是用來表徵這兩種在論述的構造及著重的面向上皆有所不同的研究取向。「哲學取向的政治哲學」其抽象層次較高同時推理也較為嚴謹，它多半是從嚴格界定的前提出發，並以逐步將限制條件列入考量的方式，去推演出理想的政治秩序或可欲的政治原則，但缺乏對於具體歷史情境及社會結構的深入分析，則是其普遍的弱點。相對地，「政治學取向的政治哲學」則十分注重對於歷史實在與政治動性的考察，同時也強調人不能從其具體的存在關係中被抽離出來，但它在抽象層次和推理的嚴謹性上皆不及「哲學取向的政治哲學」。無疑地，自羅爾斯與諾吉克有效地重新形塑了政治哲學的探討主題之後，「哲學取向的政治哲學」已儼然成為政治哲學的主流（從當前英語世界主要政治理論刊物的內容，即可得到明白的印證）。然而，後者的支持者對於「哲學取向的政治哲學」的批評往往是十分嚴酷的，除了前述的衰聶爾的批評外，亦有論者指責羅爾斯的理論在實質上乃是一種「沒有政治的政治哲學」¹⁴。在我們看來，這兩種不同的研究取向各有各的建樹，也各有各的弱點，但並無高下優劣之別。至於馬克弗森的政治理論則可謂介於兩者之間，而較為偏向「政治學取向的政治哲學」；如果說「成功的政治理論同時需要對於原則的哲學分析，以及對於政治過程和結構的經驗理解」¹⁵，那麼馬克弗森的政治理論的確具備了這樣的條件。

整體地看，馬克弗森的理論事業所欲達成的目標有四，而這四項目標又同樣都是在重建一個理想的民主社會的要求下來展

開的。

(一)探索政治現代性 (political modernity) 的根源，同時對其進行反省與批判，而其最終目的則在於規範新的政治現代性的應然走向。政治現代性是我們杜撰的名詞，柏曼 (Marshall Berman) 對於現代性有如下的形式的界定：

「存在著一種現今世界上的男男女女都共同享有的生命經驗的模式——關於空間與時間的經驗、關於個我與他人的經驗、關於生命的可能性與危難的經驗。我將稱這樣的經驗體為『現代性』。」¹⁶

對我們來說，政治現代性一詞則用來指涉近現代政治所憑藉的對於政治事務的一般的理解和經驗的模式，這包括了個人的定位、個人與他人之間以及個人與社會之間的政治關連的性質、政治社會的作用及目的等等。葛列 (John Gray) 曾貼切地指出，自由主義乃是現代性的政治理論¹⁷，不過對馬克弗森而言，這樣的說法雖然成立，但卻不夠深入，更重要的是去找出政治現代性的底層假設，俾做為反省當前人類的政治處境的理論基點。我們以為，從政治現代性的角度出發，將更能突顯馬克弗森對於十七世紀政治思想之研究的特性，而本書的第二章即在處理這個問題。

(二)考察經濟關係的政治後果，並檢討以人為本位的而非以物質生產為本位的新經濟秩序的可能性。馬克弗森所任教的母系是政治經濟系，而不是單純地稱為政治系，這也是他一直引以為傲的。在他看來，若要有效地省視人類的政治處境，則現有的經濟關係就不應該被當做是剩餘範疇。相反地，本世紀的主流自由

主義理論卻毫不遲疑地認定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正當性，而不再對其內在限制進行深刻的檢討。例如安德森 (Perry Anderson) 即指出伯林 (Isaiah Berlin) 在他那篇討論自由的影響深遠的論文裏，前後只兩度概略地提到財產，同時也不認為財產關係會廣泛地影響到自由¹⁸，其之忽視經濟的政治作用由此可見。本書的第四章及第五章將針對財產、經濟民主、經濟正義及市場，逐一討論馬克弗森在這方面的努力。

(三)解構主流政治理論的內在政治，並透過對關鍵的政治概念的重建，來賦予政治理論新的政治動性。每一種政治理論都隱含著它對於什麼才是可欲的政治秩序的評判，而即使是政治概念的選擇和界定（不管那是自由、平等或民主），也都是與這樣的評判相互呼應的。在第六章裏我們將分析馬克弗森如何展開政治理論的內部改革運動。

(四)分析自由主義民主思潮的歷史演化，以及當前民主的局限和未來的可能性。民主可謂是馬克弗森政治理論的核心主題，也是他思索人類政治生活所得到的結論。古希臘的佩里克里斯 (Pericles) 在他著名的葬禮頌辭裏曾自豪地表示：

「我們生活在一種不是模仿我們的鄰邦的政府形式裏，相反地，我們絕不是別人的模仿者，我們本身就是一個別人所模仿的模式。是的，我們的政府之被稱為民主，乃是因為我們的政府的管理並不是在少數人手中，而是在多數人手中。」¹⁹

不過，對馬克弗森來說，民主應該指涉一種社會類型，而不僅僅

只是指涉一種政府形式。就此而言，他的政治理論乃是在考察一個理想的民主社會應該是什麼的社會。我們知道，自柏拉圖以降一直到十九世紀，政治理論家們對於民主多半抱持著十分保留的態度^①，尼采更直截了當地指出「民主運動不僅是一種政治組織之衰敗的形式，也是一種人的衰敗（亦即人的矮化）的形式，它使人變得平庸同時貶抑了他的價值。」^②即使在民主已徹底取得正面聲譽的現今，民主之應用的限度也受到部分論者的關注，如克里克即謂：「民主只是政治裏的一個要素，如果民主企圖成為所有的事，它就會摧毀政治。」^③相較之下，馬克弗森則是民主的積極倡議者，我們將在第三章及第六章分別討論馬克弗森對於民主的分析，以及他自己的參與式民主理論。

在以下各章裏，討論的進行將儘量與當代政治理論的大背景相互連繫，這樣做的用意在於一方面突顯出馬克弗森的定位，另一方面則透過對於馬克弗森的討論來考察特定的理論問題的當前處境。此外，在各章裏我們都會提出相關的歸結同批評，而結論一章（第七章）則試圖對馬克弗森進行總結的評價。

註 釋

- ① Bernard Crick, *In Defence of Politics*, 2nd edn.,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82, p.186.
- ② David Held, *Political Theory and the Modern State*, Cambridge: Polity, 1989, pp.3-4.
- ③ John G. Gunnell, *Between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The Alienation of Political Theory*, Amherst, Mass.: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86, p.199.

- ④ C. B. Macpherson, *Democracy in Alberta: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a Quasi-Party System*,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53; 該書於一九六二年發行修訂版，同時將副標題改為“Social Credit and the Party System”，本書所參考的即是後面這個版本。
- ⑤ C. B. Macpherson,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Hobbes to Lock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 ⑥ *Ibid.*, p.2.
- ⑦ 其講稿則彙編成 *The Real World of Democra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 ⑧ C. B. Macpherson, *Democratic Theory: Essays in Retrieval*,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3; C. B. Macpherson, *The Life and Times of Liberal Democra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 ⑨ C. B. Macpherson, *The Rise and Fall of Economic Justice and Other Pape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 ⑩ C. B. Macpherson, “Review of *The Dilemma of Our Time* by Harold Laski”, *Political Studies*, Vol.2, No.1, 1954, p. 176.
- ⑪ C. B. Macpherson, “Review of *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y* by George Sabin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Vol.4, No.1, 1951, p.145.
- ⑫ Ellen Meiksins Wood, “C. B. Macpherson: Liberalism and the Task of Socialist Political Theory” in Ralph Miliband and John Saville eds., *The Socialist Register 1978*, London: Merlin, 1978, p.215.

- ⑬ Ellen Meiksins Wood, "Liberal Democracy and Capitalist Hegemony: A Reply to Leo Panitch on the Task of Socialist Political Theory" in Ralph Miliband and John Saville eds., *The Socialist Register 1981*, London: Merlin, 1981, pp.173, 176.
- ⑭ 參看 Chantal Mouffe, "Rawls: Political Philosophy without Politics" in David Rasmussen ed., *Universalism vs. Communitarianism: Contemporary Debates in Ethics*,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1990, pp.217-235.
- ⑮ Held, *op. cit.*, p.3.
- ⑯ Marshall Berman,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London: Verso, 1982, p.15.
- ⑰ John Gray, *Liberalism*,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86, p.90.
- ⑱ 安德森在此指的是伯林的〈兩種自由概念〉一文，詳見 Perry Anderson, *English Questions*, London: Verso, 1992, pp.70-73.
- ⑲ 引自 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Books I & II (Loeb Classical Library No.108),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8, p.323.
- ⑳ 參考 Raymond Williams,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rev. edn., Glasgow: Fontana, 1983, pp. 93f.
- ㉑ Friedrich Nietzsche, *Beyond Good and Evil*, trans. by W. Kaufman, New York: Vintage, 1966, p.117.
- ㉒ Crick, *op. cit.*, p.73.

第二章 佔有式個人主義與政治理論

政治理論的起源和目的始終圍繞在人與政治社會的關係之上，政治理論可謂源自於對這一層關係的好奇或道德的關注，而政治理論的目的則在於提供一套理解、詮釋或改善人與政治社會之關係的理念乃至於實踐的原則。因此，無論是為現狀辯護或試圖改造現狀的政治理論，無論是明白宣示或有意無意隱匿其人性假設的政治理論，都無可避免地包含了特定的對於人以及人的可能性的認知，這種認知既限定了它對不同的政治社會的評判，也限定了不同的政治理論的性質、立場及發展方向。

當然，如果我們一味地將政治理論化約成人性假設的問題，勢必嚴重扭曲了政治理論二千餘年來的實質意義及其內容的歷史演化。但除了應該保有避免陷入這種不當的、不成熟的化約論的警覺之外，一個明白的事實是：對於人以及人的可能性的認知，的確確在政治理論的形塑過程中，起著不可輕忽的重大作用。而本世紀的政治理論在這方面所面臨的問題是，能不能建立一種對於人及其可能性的一致的認知，從而使政治理論在一個共同的基礎上逐步形成一個累積性更強、知識的相互加總功能也更有效的典範？當邏輯實證論和語言哲學對政治理論的穿透達到最高潮之際，這種想法確實存在於部分政治研究者（或者，更精確地說，經驗政治學家）之中。他們試圖透過對於人的政治行為的實證研究（在他們看來，這不同於霍布斯那種思辨的、臆想的假設

及觀察)，以及對於關鍵的政治概念的檢證分析（這又必須不同於傳統政治理論那種模糊的、充滿道德意涵的概念標示），來為政治理論建立一種「科學的」基礎。但隨著邏輯實證論和語言哲學對政治理論的影響逐漸退潮回流，政治理論裏的「規範支流」和「經驗支流」彼此間的張力依舊持續著，而對於人及其可能性的形上的道德語言與經驗的科學語言之間的糾葛依然存在。

儘管「科學的」政治學的浪潮確實給予政治研究者重大的震撼和啟發，但它所引發的「科學革命」並沒有革掉傳統政治哲學的生存權，相反地，在政治理論日趨複雜的系譜裏，政治哲學雖然仍舊依附在不科學的道德論述之上，但它卻是最能夠為人類價值的衝突提供一個交錯對談場域的理論形式。當「科學的」政治學試圖尋索對於人及其可能性的一致認知的努力，逐漸顯得力不從心，同時其事實與價值必須嚴格分立的主張，也未能有效解決人類價值的衝突之際，政治理論只能保留一定的空間，讓政治哲學在其中就人與政治社會的關係進行價值評判。無疑地，這也意味著不同的對於人以及人的可能性的認知，將繼續在政治理論及人類的政治生活裏進行較量。麥金泰爾(Alasdair MacIntyre)對此有極為貼切的形容，「每一種生活方式都伴隨著它自己的人類圖像，一種生活方式的選擇都和一種人性觀的選擇攜手並進。」^①更明白地說，「不難看出的是，關於日常生活層次的政治行動的敵對說明和詮釋，都是植根於有關人性和人類行動的更廣泛的理論對立。」^②

很明顯地，馬克弗森可謂是積極介入當代政治哲學復興運動的參與者之一，同時，在為政治現代性尋根的企圖底下，他對過往的政治哲學也有著濃厚的研究興趣。更進一步說，他對近現

代（特別是十七世紀的英國）政治哲學的考察，一方面是對過往的政治哲學的歷史研究，亦即，是一種特定的詮釋觀點的鋪陳，另一方面則是他爾後逐步展開他自己的政治理論的預備工作，亦即，由於他對過往政治哲學的不滿，同時也認識到該一特定階段的政治哲學在形塑現代性上的重大作用，使他激發出自行提出一種符合其價值立場的政治理論的企圖。因此，儘管馬克弗森在一九五〇年代之前即在其為數眾多的論文及書評裏，表露他本身的理論立場，但他真正以具體的方式來展現他自己對人與政治社會之關係的主張，則以其對洛克、哈林頓、霍布斯等人的研究為肇端，並以《佔有式個人主義的政治理論》一書為初步的總結。從後設的角度來看，如果馬克弗森未曾對近現代政治哲學做過研究，未曾自一九五〇年代起陸續發表他備受爭議的研究成果，事實上也絲毫不影響他獨立地提出他自己的政治理論。也就是說，即使他對霍布斯、洛克等人的解釋存在著許多其他論者所不贊同的「偏誤」（但什麼又是對特定的古代思想家的「偏誤」的詮釋呢？對於特定的思想家的正確無誤的詮釋真的存在嗎？），這也不能被用來做為駁斥馬克弗森自己的政治理論的論據。不過，馬克弗森的投入十七世紀政治哲學的詮釋，對他的讀者及研究者來說，乃是提供了理解其理論事業的歷史縱深和內在意義的重要線索。本章即是從上述的路向來探討馬克弗森對十七、十八世紀英國政治思想的研究，但必須先行說明的是，本章的主要工作並不在於評判或仲裁馬克弗森與其他論者之間的爭論（雖然我們也會適當地注意到這個問題），而是在於突顯馬克弗森所選擇的詮釋路徑的長處和侷限。

第一節 從政治思想史到政治理論

幾乎沒有人會懷疑要想對任何人文學門的當前處境和其所關注的主要問題有深刻的理解，就必須先明白該學門的歷史，政治研究自不例外。但對於特定學門的歷史發展的知識，並不等於已經參與了該學門的進一步推展或再生。對政治理論來說，儘管經驗研究發展至今已顯露了不少內在的盲點，但經驗研究的重要啓示之一就是，唯有不斷地去探索及反省現實的各種變貌，否則政治理論將無法有效地提供理解、詮釋和改善不斷蛻變中的人類的政治存在的參考地圖。因此，政治哲學和經驗政治學之間雖存在著方法上的紛歧，但其彼此之間的關係不應該是一種水火不容的對峙關係，相反地，經驗政治學的研究發現應該被適當地援引為政治哲學的新的思考素材，俾使政治哲學的涵蓋面能展現與時俱進的態勢。

此外，經驗政治學用以否定政治哲學之合法性的主要論據——亦即，所謂的「休姆之叉」(Hume's Fork；它指的是不能從「實然」裏導出「應然」，不能從事實預設導出規範的、道德的或評價的結論)^⑤——已遭到晚近倫理學的強力反擊。有論者指出，休姆及其繼承者混淆了制度事實(institutional facts)和物性事實(brute facts)之間的不同。物性事實如「某甲體重為九十公斤」，我們當然不能由此導出類似「某甲是一個重然諾的君子」這樣的價值陳述。制度事實則是與社會屬性或基構性規則(constitutive rules)有關，例如「某甲是一個政治人物(不管是政府官員或民意代表)」，與物性事實不同的是，我們卻可由

此做出類似「某甲應該以公眾的利益為其從政的優先考量」的價值陳述^⑥。換言之，制度事實係存在於基構性規則的體系之中，而基構性規則的體系又往往包含了義務、承諾和責任，是故，從有關制度事實的陳述確實可以推演出價值陳述^⑦。另有論者則從不同的角度指出，我們並不是從事實判斷導出(derive)或演繹出(deduce)價值判斷，而是對每一個人在同樣的事實情境裏所認識到的相同的或不相同的事實，基於其信念或意識型態做價值判斷或道德判斷。因此，價值判斷乃是針對事實所做的判斷，而我們又可透過經驗和觀察的累積，不斷修正我們的價值判斷或道德判斷。準此以論，對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做嚴格的邏輯的分割，乃是不必要的^⑧。總之，當「休姆之叉」被推翻之後，它所代表的重要意義是，政治哲學做為一種論述形式仍然享有不容懷疑的合法性；當代經驗政治學的興起只是更加豐富了政治理論的內在多元性，但卻不能否定政治哲學的存在價值。馬克弗森明白地指出，「量化的經驗研究並不是使政治學向前推進的唯一方法，新的理論洞見至少也同樣是十分必要的。」^⑨此外，「語言學分析之所以失敗並不是因為它太經驗取向，而是因為它還不夠經驗取向：它未能充分考察語言和邏輯的社會本質；相反地，它接受了一種使其無法對政治義務的理論做社會詮釋的語言和邏輯。」^⑩因此，價值中立的政治學有著先天的侷限，政治理論應該勇於面對價值的衝突，而不是採取刻意迴避的態度。

在邏輯實證論和語言哲學的夾擊之下，拉斯利特(Peter Laslett)在一九五〇年代中葉曾悲觀地宣稱政治哲學已經死亡^⑪。但在今天，政治哲學又再度展現著蓬勃的生機，不過，這股生機的重現如果像某些論者所認為的僅僅只是由於羅爾斯的《正義

論》和諾吉克的《無政府狀態、國家與烏托邦》等兩書的出現所致，則未免過度簡化了當代政治哲學復興運動的整體圖像。事實上，無論是伯林、歐克夏特 (Michael Oakeshott)、阿蓮特 (Hannah Arendt)、弗傑林 (Eric Voegelin)、黑勒 (Agnes Heller)、海耶克 (Friedrich A. Hayek)、泰勒 (Charles Taylor) 或麥金泰爾，都在各自的立場以及不同的側重面向上對於人與政治社會之關係、自由、平等、民主、正義、政治秩序和人的自主性等問題，提出了有力的同時也具有完整體系性的思考成果。無疑地，馬克弗森也應被歸屬於此一政治哲學復興運動的行列之中。但不容忽視的是，在史特勞斯 (Leo Strauss)、史基納 (Quentin Skinner)、波寇克 (John G. A. Pocock)、拉斯利特、席克拉 (Judith Shklar)、阿文納里 (Shlomo Avineri)、但恩 (John Dunn)、萊利 (Patrick Riley)、密勒 (David Miller) 等人的引領下，所持續進行的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可謂是當代政治哲學復興運動的先頭部隊。史特勞斯等人的努力使古典政治哲學繼續受到應有的重視，並使其成為政治理論的珍貴遺產；此外，史特勞斯等人對特定思想家和思潮的研究——如波寇克之於哈林頓、馬基維利及共和主義，史基納之於宗教改革及馬基維利，史特勞斯之於古希臘、馬基維利、霍布斯及自然法傳統，席克拉之於盧梭及孟德斯鳩，阿文納里之於黑格爾及馬克思，但恩之於洛克及自由主義，萊利之於康德及近代法國政治思潮，密勒之於休姆及無政府主義，拉斯利特之於洛克及功利主義——也使古典政治哲學所關注的重要問題，在歷史關連性及政治概念的清晰性上，獲得更深刻的澄清與開展。要言之，對於古典政治哲學的研究提供了當代政治哲學一個可以繼續發展的

基礎，在這個基礎上，我們一方面得以了解今日之所以為今日的原因，另一方面則可以使古代的智慧成為協助我們進行當代思考與探索的參考。固然我們不可能倚賴古代的智慧來解決我們當前所面臨的所有問題，但幾乎可以說，當代政治哲學的不同的創見，或多或少都可以在過往的傳統中找到其雛形或源本，這些新的創見可謂是對傳統理論的繼承、修補和轉化，雖然其思考的對象是當前的人與政治社會的關係。

在這項先遣的預備工作上，馬克弗森也參與了磚石的鋪設，這使馬克弗森同時做為一個當代政治哲學的構築者和古典政治哲學的詮釋者。這樣的雙重身份有效地呈現出馬克弗森理論事業的歷史縱深，也突顯了他對政治現代性的質疑、憂慮及改革的企圖。而就馬克弗森實質的思想史研究而言，他乃是試圖從一個嶄新的角度(亦即佔有式個人主義)來詮釋別的研究者所忽視的十七世紀英國政治思想的底層脈絡，但馬克弗森的詮釋也引起多數論者的質疑和挑戰。我們似乎可以這麼說，如果當代的社會理論就某個程度而言是在對馬克思的理論做反動及註腳，那麼，當前關於十七世紀英國政治思想的歷史研究，在某個程度上來說乃是在對馬克弗森的詮釋做反動及批判。我們不難發覺馬克弗森對霍布斯、洛克、哈林頓及平等派的分析與詮釋，在個別的完整性上顯然不及某些霍布斯專家、洛克專家等所做的詮釋。不過，必須注意辨別的是，馬克弗森的主要目的並不是在對霍布斯、洛克或哈林頓做全面性的、鉅細靡遺的再呈現，相反地，他的目的乃是在考察貫穿十七世紀英國代表性政治思想家的一種對於人及政治社會的基本假設。此一基本假設，在他看來，不僅規範了政治現代性的走向，也是使當前西方社會仍然做為一種阻礙人類實現之普遍

落實的社會形式的重要原因。因此，做為一個十七世紀政治哲學的詮釋者，馬克弗森的問題意識顯然是與霍布斯專家、哈林頓專家或洛克專家不同的，也就是說，馬克弗森和彼等專家的研究對象雖然相同，但在接觸與趨近的方法上卻迥然不同。

我們在前面說過，對於過往的政治思想家能否有一種正確無誤的唯一的詮釋存在，是十分可疑的；事實上，不同的詮釋者在方法上的差異也反映了其「政治傾向（political leanings）的差異。」^⑩馬克弗森曾經質問：

「是否可能不去採取一個批判的立場，而能闡釋一位過往世紀的思想家的理念，以使一位現代的讀者能從中獲益？甚至也不試圖去指出該思想家所做的而並不為我們所自動接受的社會假設？」^⑪

馬克弗森認為這乃是不可能的。在他看來，政治思想史的工作應包括試圖去指證特定的思想家對於人及政治社會的基本假設，這不僅有助於將該思想家回置到他的歷史系絡之中，也使我們更能理解其理論體系的內在邏輯。而馬克弗森也不諱言此一指證工作的操作過程，實質上又受到不同詮釋者的政治傾向及價值立場的影響。其實，只要我們稍加思量巴柏（Karl Popper）的政治傾向及主張，我們就不難理解他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中的問題意識及其處理柏拉圖和黑格爾的方法，而這在一定的程度上也說明了馬克弗森在思想史方法論上的誠實而直率的態度。

至於政治思想史家的工作是不是僅在於將過往思想家的理論歸置到他們所身處的時代，同時對不同思想家的理論做比較研究，

並以此為思想史家的功能的界限呢？對馬克弗森來說，這乃是一種過於消極保守的自我設限。他認為政治思想史家更應該進一步釐清特定思想家的理念與社會變遷之間的互動關係，這項後續的工作是一位敏銳的政治思想史家所不能也不應荒廢的，「拒絕對理念與社會變遷之間的關係做考察，等於是說政治理論的問題——或者至少是說政治理論史家的問題——只是為了理念本身而去研究理念，而不是在於研究社會或社會變遷。……如果遵循這條路徑，則只會導致人本主義政治學（humanistic political science）的衰微。」^⑫馬克弗森在此並不是在擡高社會或社會變遷的重要性，而去貶抑政治理念的作用，相反地，他並不是一個粗俗的（vulgar）物質論者，他的用意在於強調政治思想史家不能孤立地處理特定思想家的文本（text），不能僅僅著重於檢視文本的內在一致性，而忽視了文本所指涉的理念是如何與社會實在相互關連，「對一個理論的一致性的批評當然是一種有用的邏輯練習，但如果在辨明了某一理論的倫理和科學預設之後，還能進一步考察這些預設如何與該理論的生成背景所形塑的問題相互關連，那麼，這種批評就更為有用了。」^⑬

準此以論，由史基納、波寇克、但恩等人所領導的「新政治思想史」（“new”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運動，儘管對馬克弗森多所批評，但究其實，他們對政治思想史的方法要求實有頗多類似之處。「新政治思想史」的倡導者強調，除非一個詮釋者深刻地明白了特定思想家的意圖、語言以及該思想家對他所身處的環境的理解，並避免將詮釋者本身的情境包袱涉入其中，否則就無法做出忠實的詮釋^⑭。此外，思想史家除了要能夠對特定思想家的理念做哲學分析，他還必須具備歷史分析的能力，非歷